

## 深读·封面故事



▲2011年10月15日,当年的知青乘坐卡车来到波罗峪。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 相关链接

山东知青史:

## 跨越三十个年头 44万人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根本出发点是试图将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村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

## 发端 1955年

1955年由团中央发起了青年志愿垦荒运动,参加人数最多的当数山东。第一批是共青团山东省委在莱阳组织的“山东省青年志愿垦荒建设第一队”,共有队员224名,被分配到黑龙江集贤县。1956年3月,共青团山东省委在济南、青岛等地组织了1221人的第一支由城市组织的支援垦荒队伍,其中很多是城市知识青年。此后又有10万名山东青壮年移民黑龙江垦区。

## 开始 1964年

1964年5月,根据国家分配给山东3.3万人下乡插队(不包括回乡人员)的任务,济南7000人到泰安、临沂地区的农村插队,青岛7000人到烟台、昌潍地区的农村插队,淄博2000人到惠民、临沂地区的农村插队,枣庄500人到济宁地区插队;其他地区城镇的下乡人员都在本地区的农村插队。

据统计,1964年全省动员上山下乡的知青是11671人。到了1965年,全省实际上山下乡11183人。

山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另一个方向是支边,到青海、甘肃、新疆等边疆地区。

1965年,动员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枣庄、潍坊、济宁、德州等8个城市共3002名知识青年参加青海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又在上述8市动员4529人参加,两年赴青海的山东知识青年人数达到7531人。

1965年、1966年,分别有4229名、2544名山东知青参加甘肃农建师。

## 高潮 1975年

从1975年起,山东实行了由学校定向、单位定位、按系统对口动员上山下乡的做法,明文规定“对应下乡而不下乡的青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他们中间招工、招生、征兵”。这一年,下乡知识青年达到122010人,是1973年的469倍多。1974年至1975年,山东共有186229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历史最高潮。

## 尾声 1978年

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1979年2月,回城风刮起。至1980年,山东共招收39万名知识青年回原动员城市或跨地区就业。1981年4月,各级知青办停止对外办公。至此,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基本结束。

据资料统计,从1964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开始,到1979年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山东省共有435822名知识青年到农村生产队落户当农民。在城市中,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子女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曾经年少

## 穿越那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山东知青们

(上接B01版)

在一份口述实录里,徐建春回忆那一段岁月,多次表示“最难忘的就是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这样最难忘的时刻,在她的青春岁月里曾经连续出现了12次。

“每个时代的‘成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色彩,比如衡量标准和实现途径等,很多时候都截然不同。”研究山东知青史多年的作家卞奎也认同,“在注重政治生活的当时,以徐建春为代表的知青明星,实现了最高理想,成为一代人的榜样,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抉择。”

### 梦想照进现实

回忆当年的知青岁月,现在早已成长成为一名成功商人的许树基坦言,自己之所以能够“混得还不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自己的适应能力很强。

他说,“其实,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如果一味抱怨环境不好、氛围不公、人浮于事,那么,注定一事无成。”

虽然当初很不情愿地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但在火车上的三天三夜里,许树基已经展现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

在那个业余生活贫乏的岁月里,会吹拉弹唱的人,一向被人们捧为明星。家住大观园附近的许树基,从小就在那里听快书,尤善模仿。当一个爱好曲艺的小学同学在火车上发现了她,当即邀她出任捧哏,表演相声。

笑声很快压过了车厢角落里隐隐的抽泣,列车抵达西宁,许树基和同学二人已经成为知青中的名人。随即,作为山东知青的代表,在西宁举行的欢迎知青晚会上,二人受邀登台献艺。

许树基回忆,从山东平原到青藏高原,建设兵团的艰苦环境不难想象。但当时,是人才,大都格外受重视,就跟今天各单位选拔人才一样。卞奎1966年从青岛前往青海生产建设兵团,因为拉得一手具有专业水准的小提琴,几乎没有下过农业生产连队,就被选拔进入了宣传队。

挑肥料,我一天挑六七十趟,全连队都没有比过我的。后来,这个排长又找我谈话,主动承认是他对我有偏见,对我的安排是不妥的,重新让我开拖拉机。”

从履带拖拉机到轮式拖拉机,许树基开过的拖拉机几乎可以排列成为拖拉机的“进化史”。

人不可以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

在被裹挟的人生选择中,许树基相信,自己的行为选择是主动的。

###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当然,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上山下乡的知青自然也是如此。

“去兵团还算好的。”对电视剧《知青》的热播,原山东省知青办主任孙丹华也多有关注。6月28日,与记者聊起那段经历,孙丹华老人说,正如《知青》中展现的,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各方面的状况都要比去兵团的知青更困难。

1975年,孙丹华带领知青在泗水插队锻炼,一年后返回省城,担任省知青办主任。正是在担任知青办主任期间,孙丹华开始接触到知青对不公的种种声讨,并积极思考如何保护知识青年的问题。

这时候,上山下乡实际已经进入末期,很多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或参加招工。但一些问题经过了十年动荡时期的积郁也开始发酵,比如村支书借招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等迫害知青的事件开始曝光。

“当时,经常有一些知青到知青办反映情况。”孙丹华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及时向

省委做了汇报,最终促成了几起恶性案件的从严、从快、从重解决。

当时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让一些知青常常无端陷入被批斗的漩涡。许树基也曾挨过批斗,他记得,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人干活,都去参加运动”。

转眼间,这些当初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成了很多知青一辈子的回忆,许树基与爱人正是在兵团结婚的。“也不存在谁追谁,开始都是一帮知青说‘我看你和谁不错,快去谈谈吧’。起初不当真,但大家都那么说,我就真去找她拉了,‘同意吧?’一听同意,就这么定了。”许树基说,那时候的感情都比较单纯,而婚姻生活的到来,也让生活不再那么单调。两个人的结合有时候比想象的更简单。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历经长久的期盼与煎熬的知青,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即将过去的时候,等来了安置回城的春风。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并不是每一段姻缘的结合都是甜蜜与幸福的。

### 当爱恨已成往事

当政治氛围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日渐淡去,当年那些年少轻狂的知青,已渐渐步入暮年。

已经65岁了,许树基越发追忆那些遗落在青藏高原的“青春”。“从那里离开的时候,我们好多人都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但一些年过去了,回去看看的愿望却越发强烈。”1998年、2000年,许树基两次回到格尔木,而现在,“又想回去

了”。

下乡,返城。如果不是隔着时代的河流,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当他们选择返城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知青杨春明1970年参加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在下乡期间表现突出,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1976年11月,杨春明担任任津县委副书记。但就在这时候,战友们陆续返城了。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杨春明,“再也无法压抑重返故乡与家人长期厮守的强烈愿望”,毅然向组织提出不当县委副书记,按照知青返城政策回济南。次年3月,他终于重获“济南籍”。

然而,“原以为回到济南照样可以干革命,可是,从那以后,无论我再怎么能干再怎么来补救,也没能重现当年的那些辉煌”。

时代的转变注定使人无法始终停留在一种维度上,孙丹华笃信,上山下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并不适合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去肆意打量。事实上,它和那个时代一起,属于一代人的记忆。它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其实和今天的种种一样,都有着时代的必然。

许树基渴望留下这一个时代的背影。守着一处保留完好的“知青村”,在济南南郊那个叫做波罗峪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收藏起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去年,他举办山东首届知青文化节,邀省内的数千名知青前来重话当年。即将到来的9月份,他策划举办的中国首届知青文化节又将开幕。

1981年,许树基携妻带子返回家乡。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回来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岁月的蹉跎中他一下子就想起了《红旗谱》中朱老忠30年后回家乡的情形,各种物是人非。

一个少不更事的年纪,倏然就过去了。

所幸的是,“我们失去过许多,但没有全部失去……”同样是回忆那一段岁月,曾在日照插队的知青尹凤鸣说,“我们与共和国一起走向成熟。”

1965年,许树基第一次登上远行的列车,那一年,他18岁。那一年,共和国16岁。

(部分史料据《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青档案实录》,山东省档案局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老照片(给毛主席点烟的人)。(资料片)